

## 宋代水居蠻民命名略論

詹堅固

**提 要：**水居蠻民命名起源於晉代或唐代證據稍顯不足。用“蠻”命名水居蠻，最早在北宋初年，且所指涉的只是嶺南水上族群，之後才由南遷漢人傳播開來。它反映了宋代漢人勢力已經從長江流域擴展到華南沿海，也反映了嶺南族群分類的形成，這是嶺南社會發展與變遷的結果，也是漢文化在嶺南佔據主導地位的體現。

**關鍵詞：**宋代；水居；蠻民；命名

在粵、閩、桂、瓊、港、澳等南方沿海地區的江海水面，曾生活著一群以船為家或編篷水滸的特殊人群，被漢人稱為“蠻”。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起，學界從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範疇，對蠻民的起源、分佈、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在不少問題上達成共識。然而，對水居族群何時被命名為“蠻”這一問題仍有不同意見。筆者在《試論蠻名變遷與蠻民族屬》一文提出以“蠻”稱呼水居蠻乃在宋代初期，但限於篇幅未能很好展開。本文擬在此基礎上，對水居蠻民命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論述。

“蠻”用於指代族群名稱，起於漢代。他們最初被稱為“誕”。東漢後期，“蠻”開始作為族群名稱。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載：“（涪陵郡）多儂、蠻之民……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廣都縣）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為巴郡大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儂民北送及墓。儂蠻鼓刀辟蹠，感動路人”<sup>①</sup>。諸葛亮、朱辰都是東

① 常璩，《華陽國志》（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12、35。

漢人，證明“蠻”這一名稱在東漢時已有。清人鄭珍考證“蠻”字時也指出：“蓋漢已來乃有此種夷稱號，其文作蠻”<sup>②</sup>。漢至五代間，“蠻”一直用來指代長江中上游流域的蠻族，包括渝東、鄂西、黔東一帶的巴州蠻和湘西武陵地區的荊州蠻，後者是前者移民的後代。為何將這些蠻族稱為“蠻”史無明載，字書《文字集略》作“蠻屬”解；北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將“蠻”列為新附字，作“南方夷”解，兩者都只說蠻是南方地區蠻族。蠻族得名可能是與其善於操舟的特性有關。此外，“蠻”還用來泛稱南詔、廣西及其它南方地區少數民族，與蠻的泛稱同義。儘管“蠻”字在宋代以前用來指代南方地區蠻族，但無一例說“蠻”是水居族群名稱。這些史料所反映的長江流域蠻族族群特徵是居住陸地，以採摘及狩獵為生，習於操舟等<sup>③</sup>。

對水居族群何時開始被命名為“蠻”，學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持晉代論，更多人持唐代論。

明代黃佐編纂的《廣東通志》卷68轉引《晉書》之陶璜上疏，有“晉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蛋雜居”<sup>④</sup>之句，之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也引用此文。晉代論者據此下結論，稱嶺南水居蠻民名稱早在晉代已經出現。但是，筆者查中華書局版《晉書》，該文原作：“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清刃，禮樂是務。而此州（指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才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甯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sup>⑤</sup>陶璜臣服晉朝前為吳國交州刺史，他的上疏是針對東晉初年減少州郡駐兵而言，認為交州、廣州、寧州等地不賓服者多，而服從官府者少，不宜減兵。我們姑且不論陶氏想保全其既有勢力而誇大事實的用意，該文內只述及廣州南岸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並無“皆蠻蛋雜居”一句，則該句並非陶璜原話，而是黃佐的引申之詞，它

② 鄭珍，《說文新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255。

③ 膚堅固，〈試論蠻名變遷與蠻民族屬〉，《民族研究》1（2012）：81-87。

④ 黃佐，〈廣東通志〉，收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廣東歷代方志集成·省部（4）》（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68.1819。

⑤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57.1560。

只表明黃佐等人認為蠻民的歷史久遠，其前身或可以追溯至晉代。我們不能據此認定水居蠻民的名稱在晉代已經出現。

唐代論者依據稍複雜。有人把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其（箭竹）筍叢生，轉復牢密，邕州舊以為城，蠻蠻來侵，竟不能入”<sup>⑥</sup>中的蠻蠻當做嶺南水居蠻民，認為其稱謂早在唐代已經出現。這或許是對該文的誤解。邕州即今廣西南寧，中唐以後，南詔曾數次侵犯該城，事見《新唐書》卷222《南蠻傳》，此處蠻蠻是指南詔。又有人把唐代柳宗元《嶺南節度饗軍堂記》中“胡夷蠻蠻”之“蠻”當作嶺南水居蠻民，這或許也是誤讀。該文云：“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鹹次於位。卉裳罽衣，胡夷蠻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sup>⑦</sup>此處“胡夷蠻蠻”並稱，並非說當日聚會有胡人、夷人，“蠻”與“胡、夷、蠻”一樣，都是少數民族泛稱，指代前文的“群僚”。此外，在談及嶺南蠻民的最早冠名時，有人引用唐代王勃《廣州寺碑》“揚粵當唐初，北人多以商至，遂家於此。六朝以來謠俗謳歌播於樂府，炎方勝事自是偏聞四海。然方言猶操蠻音，以邑裏猶雜疍夷故也”，認為指代廣東水上居民的“蠻”早在唐代已經出現。然而，考察各版本王勃著作，都無《廣州寺碑》碑記，只有一篇名為《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的碑記，《廣州寺碑》估計是此碑記簡稱。上元二年（675年）王勃前往交趾探望被貶謫的父親時經過廣州，適逢廣州寶莊嚴寺（今六榕寺）修葺一新，應該寺僧人之請，寫下這篇長碑文，之後王勃就在渡南海時溺水身亡。該碑文內並沒有上引之文。因此，據此認定指代廣東水上居民的“蠻”早在唐代已經出現，是值得商榷的。

以“蠻”命名水居蠻，最早在北宋初年，且所指涉的只是嶺南水上族群。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57記：“（新會縣）蠻戶，縣所管，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為業。若居平陸，死亡即多，似江東白水郎也”，“（瓊州）又別管蕃、蠻二坊戶，在符江口東岸，不耕田，以捕魚為業，官司亦差為水工駕船”<sup>⑧</sup>。這是有關“蠻”為水居族群的最早記載，作

⑥ 劉恂，《嶺表錄異》（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中. 10。

⑦ 柳宗元著，曹明綱標點，《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20。

⑧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157. 3021、3235-3236。

者從居住狀況——舟居、職業——捕魚為業、生活習性——習於水上生活等方面為嶺南蠻民族群屬性下定義。顯然，宋代用蠻指代嶺南族群也是由於其習於水上生活，正是這一與長江中上游流域蠻族族群相似的特徵，使宋人用“蠻”命名嶺南水居蠻。此後文人士大夫對蠻民的定義不出此範圍。稍後，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軾、秦觀、唐庚等人貶官嶺南，留下不少描寫蠻人的詩文。蘇軾有“海康雜蠻蟹，禮俗久未完”；“艤舟蠻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桄榔間”；“蠻酒蘖眾毒，酸甜如梨渣”；“但須得泉人許久船，即牢穩可恃，餘蠻舟多不堪”<sup>⑨</sup>；“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蠻子船”<sup>⑩</sup>等。秦觀有“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試問池邊蠻，云今累年閑。”<sup>⑪</sup>唐庚亦有詩詠蠻戶：“晚落炎州磨歲月，欲從諸蠻丐煙波。”<sup>⑫</sup>由於蘇軾等人名氣很大，嶺南蠻民也隨其詩文在文人士大夫間流傳而為人熟知。如陳師道終身沒到過嶺南，但其《後山談叢》卷六卻說：“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瑤人，舟居謂之蠻人，島上謂之黎人。”<sup>⑬</sup>由於陳師道與蘇軾、秦觀交往甚密，陳氏對蠻民的了解或許來自他們。又如黃震為寶佑四年（1256年）進士，終身為官浙江，也沒有到過嶺南，但其〈黃氏日鈔〉卷67也記：“蠻，乃海上水居之蠻，其種有三，魚蠻取魚，蠣蠻取蠣，木蠻伐山。皆坐（疑為“生”字）死短篷間，生食海物。其生如浮，而各以疆界役於官。”<sup>⑭</sup>黃震所抄，實際上是周去非《嶺外代答》蠻蠻條的內容，說明當時周著已流行。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序言中也說他從嶺南北歸後，常有親戚故人問起嶺南風土人情：“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sup>⑮</sup>，在這問答間，蠻的名稱也就流傳開了。因此，南遷文人對嶺南水居蠻人名稱的傳播起著重要作用，隨著曾在嶺南生活過的人北返，也將蠻的名稱傳給了從未到過嶺南的人們。此後，文獻記載中出現的“蠻”，基本上是指代嶺南水居族群；它是宋代漢族文人

<sup>⑨</sup> 蘇軾著，毛德富等主編《蘇東坡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426、742、457、3674。

<sup>⑩</sup> 乾隆纂選：《唐宋詩醇》（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1997），366。

<sup>⑪</sup> 周羲敢、程自信、周雷編注，《秦觀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319。

<sup>⑫</sup> 王雲五主編，吳之振、呂留良、吳自牧選編，《宋詩鈔》（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1306。

<sup>⑬</sup> 陳師道撰，李偉國點校，《後山談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6.77。

<sup>⑭</sup> 黃震，〈黃氏日鈔〉（《四庫全書》），67.63-64。

<sup>⑮</sup>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序.1。

士大夫對他們的命名，是他稱。

宋代，也有人將福建水居族群稱為“蠻”，但更多地稱“白水郎”、“庚定子”、“遊艇子”、“盧亭子”等，說明“蠻”在福建的使用不太普遍。今浙東沿海地區當時也有水居族群，他們被稱“白水郎”、“庚定子”，稱呼與福建相同，樂史《太平寰宇記》就說，明州鄮縣“東海上有野人，名曰庚定子。舊說云昔從徐福入海，逃避海濱，亡匿姓名，自號庚定子，土人謂之白水郎。”<sup>⑯</sup>今見宋代史料，沒有將浙東水居者稱為“蠻”的記載。這也為蠻名稱的傳播途徑提供線索，即水居蠻民稱謂最初起源於嶺南，之後才被使用於福建。此外，宋代還將交趾水居族群稱為“蠻”，周去非說：“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於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其以魚蚌易門米尺布者，謂之交趾蠻。”<sup>⑰</sup>交趾在今越南北部，宋代時已經正式承認安南是自治的藩屬國，不再是直接管理的中國本土。儘管如此，交趾在宋以前屬廣義的嶺南地區，又與廣西接壤，具有相同生產生活特徵的族群也就被稱為“蠻”了。該史料說明，宋代對“蠻”的命名是根據該人群的生產生活特徵，而非地理區別。

水居蠻人命名起於宋代嶺南，證據有三：一，北宋初，徐鉉等人奉詔校訂《說文解字》，將魏晉南北朝流行的“蠻”字作為新附字列入字書，解釋為“南方夷，從蟲，延（讀作 dàn）聲”<sup>⑯</sup>，此處徐鉉並未將蠻解釋為“水居蠻”，而只說是“南方夷”，即蠻民只是南方地區蠻族。長江流域及以南，一直被稱為南方，長江流域蠻族因與中原漢族文化不同，而被稱為蠻夷，生活在其間的蠻民即其中一類。此乃繼承南朝字書梁阮孝緒《文字集略》之“蠻”為“蠻屬”的定義。這說明在宋初中原，將“蠻”作為嶺南水居族群的稱呼還不流行。但到了南宋，精通文字音韻的毛晃和戴侗都將“蠻”注釋為舟居蠻夷，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曰：“蠻，南夷海種也”<sup>⑰</sup>；戴侗《六書故》卷20曰：“蠻，蕩旱切，蠻，舟居者”<sup>⑱</sup>。此時，經過北宋時期

<sup>⑯</sup>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98.1960。

<sup>⑰</sup>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5.196。

<sup>⑱</sup> 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283。

<sup>⑲</sup> 轉引自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133.4183。

<sup>⑳</sup> 戴侗，《六書故》（《四庫全書》），20.28。

的使用和傳播，“蟹”為“水居蟹”的定義已經非常確定與流行了。二，《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序》曰：“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蟹遭劉。”<sup>②</sup>此處文字是歐陽修對十國政權發表的議論。劉漢政權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對珍珠的癡迷，劉鋹為採珠設置了媚川都，招募二千人從事此項工作，採珠者死傷甚多，因此歐陽修有劉漢政權“牢牲視人”的評論。從遺留下來的南漢史料看，沒有將這些採珠者命名為“蟹”的記載，而在北宋歐陽修的著述裏，明確說這些採珠者名為“蟹”。此也是嶺南水居“蟹”人命名起於宋初的力證。三，周去非《嶺外代答》“珠池”條說，採珠者為蟹人，並指出：“東廣海中亦有珠池，偽劉置軍採之，名媚川都。死者甚多，太祖皇帝平嶺南，廢其都為靜江軍。”<sup>③</sup>說明劉鋹採珠人在宋代稱為“蟹人”。另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說：“朕嘗讀太祖實錄，見劉鋹進珠子馬鞍，太祖知鋹所採珠子甚多，日役蟹丁數千人，死者不少。朕以謂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難得，且傷人命，特令罷貢，以為一方無窮之利。”<sup>④</sup>此處將南漢劉鋹採珠之人明確稱為“蟹丁”。綜上所述，五代時尚未將蟹用於稱呼嶺南水居族群，入宋以後才有此命名。

其實，宋代長江流域湖網密集之地，也有從事捕魚並居住船上的漁民，但他們卻未被命名為“蟹”，一般稱他們為“魚蟹子”。在嶺南留下不少描寫蟹人詩文的蘇軾，就有一首《魚蟹子》詩：“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蝦以為糧，不耕自有餘。異哉魚蟹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于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sup>⑤</sup>這些人“舟楫為室居，魚蝦以為糧”，也是“於焉長子孫”，與嶺南水居蟹民生產生活方式相似，但作者卻明確說他們“本非左衽徒”，即不是漢族以外的人。王象之《輿地紀勝》也說：“蟹家即江淮所謂魚蟹子”<sup>⑥</sup>，水居者在嶺南稱為蟹家，在江淮則被稱為魚蟹子。此外，南宋高翥有《船戶》詩描述：“盡將傢俱載輕舟，來往長

<sup>②</sup> 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61.747。

<sup>③</sup>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7.259。

<sup>④</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175.2889。

<sup>⑤</sup> 蘇東坡著，毛德富等主編，《蘇東坡全集》，243-244。

<sup>⑥</sup> 王象之，《輿地紀勝》（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102.826。

江春復秋。三世兒孫居柁屋，四方知識會沙頭。老翁曉起占風信，少婦晨妝照水流。”<sup>⑯</sup>此處稱長江上以船為家者為船戶，也不稱蟹戶。產生這種不同主要是長江流域在宋代之前已經開發，當地居民除了僻遠少數民族，都已經漢化，文化上已與漢族趨同，故不將他們稱為“蟹”。

那麼，這些蟹人是否到宋代時才橫空出世呢？當然不是。根據事物的發展規律，蟹民先人並非到了宋代才出現，而是此前具有蟹民族群特徵的人一直就生活在當地，只是還未被統一命名，各地根據當時習慣，將其稱為“家浮筏者”、“白水郎”、“龍戶”、“盧亭”、“珠民”、“木客”，等等<sup>⑰</sup>。北宋初期對蟹民進行命名，只是將原用來稱呼長江中上游流域蠻族的“蟹”套在沿海地區水居族群身上。原長江中上游流域的蟹人在強大的漢人勢力壓迫下，或被消滅，或被同化，入宋以後，這一族群基本消失了，只留下了蟹的名目。這時只有嶺南和西南等邊遠地區還沒有完全納入宋王朝的統治版圖，處在這些區域的蠻族因風俗禮樂與中土不同，在以正統文化自居的宋代文人士大夫眼裏，他們就是“蠻”、“蟹”。就這樣，一個即將消失的族群名稱“蟹”被宋人賦予了新的內容，成為指代嶺南水居族群的專有名詞。正如日本學者桑田六郎、可兒弘明所指出的那樣，東晉南朝史料中的“蠻蟹”，都是指長江流域的蠻族；唐代史料中的“蟹蟹”或“蟹蛋”，及宋代史料中的“蟹戶”，則是指居住在更南方如雲貴高原和嶺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時間越往後，“蟹”的指稱對象就越向南方移動<sup>⑱</sup>。

為何到了宋代，嶺南非漢族群會被重新命名呢？宋代以前，嶺南地區由於遠離中原，開發較遲，基本上是非漢民族，即所謂蠻夷的聚居地。如劉龔於乾亨元年（917年）即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封妻馬氏為越國夫人<sup>⑲</sup>。國號為“越”，是因其發跡基地封州一帶“多俚僚”，其國內主體民族是越人，也表明她是一個非漢民族政權。次年，劉才以漢朝劉氏後裔的身份改國號為“大漢”，也有仰慕中原文化之意。宋代以前的中原學者甚至未

<sup>⑯</sup> 金性選注，《宋詩三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32。

<sup>⑰</sup> 詹堅固，〈試論蟹名變遷與蟹民族屬〉，《民族研究》1（2012）：89。

<sup>⑱</sup> 桑田六郎，〈蟹族の源流に關する文獻的考察〉，《南亞細亞學報》1（1943）：1-16。可兒弘明，〈“蟹民”的異民族出自説をめぐって〉，《中國大陸古文化研究》6（1972）：19-27。

<sup>⑲</sup> 梁廷楠，《南漢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2.7。

將嶺南置於禹貢九州之內，五嶺成為華夷文化象徵之界。在中原文人士大夫眼裏，嶺南人基本上是蠻夷，他們對嶺南人了解不多，史書上多用南越、揚越、駱越、烏滸、俚、僚等名稱來泛稱嶺南民族。以越文化為主體的嶺南民眾，不會感覺到自己有何特別之處，也沒有蠻夷觀念，當然不可能使用象徵著蠻族的“蠻”來命名這些與他們朝夕相伴的水居族群。宋代，隨著嶺南重新納入統一的中原王朝，大批中原人士遷居嶺南，國家經濟重心南移，嶺南由“化外之地”逐漸變為“神州”的一部分。此時漢文化逐漸成為主流文化，漢人才對異質的嶺南文化產生差異感，進而以正統文化身份將其斥為“蠻夷”。只有這時，水居族群“蠻”的名稱才會出現。正如范成大指出，嶺南非漢族群被稱為蠻，是因為“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法制尤疏，幾似化外”<sup>⑩</sup>。

嶺南水居蠻人的命名反映了宋代漢人勢力已經從長江流域擴展到華南沿海。隨著漢人對嶺南的進一步開發，漢人勢力向邊陲擴展，接觸到與中原文化大異其趣的所謂蠻族文化，漢人對邊疆少數民族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化。為便於政府的行政及文書記述，需要為這些族群創造新的名號，不少南方少數民族被冠以新的名稱，嶺南畲族、壯族的族稱是宋代首創，瑤族、黎族、蠻族名稱雖前代出現過，卻是用來指涉嶺南以外族群的名號，它們在宋代被用來指代嶺南民族，賦予其新的內涵並固定下來，一直沿用至今。

嶺南蠻民的命名還反映了嶺南族群分類的形成。族群分類只有在與外來族群的對比之下才能顯現。宋代，漢人南遷嶺南增加，在人口比重上已佔一定比例，他們從漢文化角度觀察異文化的嶺南土著居民，自然地將其劃為他群。蠻民的族群特點在宋初被樂史概括為“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為業”後，經過蘇軾、陳師道、范成大等一批文人學者的傳播，到周去非對蠻民相關見聞進行詳細總結，可以看出，漢人對蠻民的族群特徵有了明確的認識。如陳師道已將嶺南土著大致分為三類：“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瑤人，舟居謂之蠻人，島上謂之黎人”，此後直到明清時期，人們在論述嶺南民族時，一直沿用這種族群分類法。范成大對廣西族群也進

<sup>⑩</sup>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134、135。

行具體分類：“蠻之區落，不可悉記。姑即其聲聞相接、帥司常有事於其地者數種，曰羈縻州洞，曰猺，曰獠，曰蠻，曰黎，曰蠶，通謂之蠻。”<sup>①</sup>周去非也明確說“諸蠻”中有“海外黎蠻”、“蠶蠻”、“瑤人”。宋人對嶺南族群的分類大同小異，對其族群特徵的描述具體，反映他們對嶺南族群的認識已較深刻。此外，“蠶家”稱謂的使用也是族群分類形成的證明。宋人著作多次提到“蠶家”名稱，如《嶺外代答》曰：“蠶家自云……珠熟之年，蠶家不善為價。”<sup>②</sup>《輿地紀勝》也記：“（梅州）蠶家。蠶家即江淮所謂魚蠻子”，“（瓊州）蠶家。圖經云，蜒戶，以船為生，居無室廬，專以捕魚自贍”<sup>③</sup>。所謂家，是指經營某種行業的人家或有某種身份的人家，是族群分類的稱謂。後世“土家”、“客家”等稱呼也屬於這一類型，“土家”意為“本地人”，“客家”則意為“外來人”。蠶家稱呼只有較多的漢人移居到嶺南地區以後才出現，漢人將其當作與自己不同類的人。

由於漢人大量移居嶺南，蠶民有了文化參照，他們的民族自我認同意識開始逐漸形成。正如周大鳴指出：“在與世隔絕的孤立群體中，是不會產生族群認同的，至少族群認同是在族群間互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一個族群中的個體，從未接觸過異質的文化，那麼就無從產生認同。首先存在一種差異、對比，才會產生將自己歸類、劃界的認同感。這是認同產生及存在的基本條件。”<sup>④</sup>蠶民有著獨特的生產方式，講獨特的語言，穿戴獨特的服飾，住在水邊洞穴或簡陋竹木棚，有自己的家庭倫理和社交、婚姻習慣，這些自異於漢族和其他族群的生產生活方式，為本民族內部自我認同提供了基本條件。同時，由於漢人對他們的剝削、歧視以及政治壓迫，蠶民不會產生與漢人一致的認同感。“族群認同感包含著族內認同感和族外認異感。族內認同感的產生，由文化相似性、語言同一性、歷史來源一致、共同的居地範圍以及功利性目的引起。族外認異感既有本群體認識到別群體的不同，也有

<sup>①</sup> 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134。

<sup>②</sup>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7.259。

<sup>③</sup> 王象之，《輿地紀勝》，124.938。

<sup>④</sup> 周大鳴，〈從“漢化”到“畲化”談族群的重構與認同〉，收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編《族群與族際交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3。

別群體認識到與該群體的相異。”<sup>⑤</sup> 蠻民由於文化淵源的一致而產生族內認同感，又因文化差異和民族壓迫而產生與漢人的族外認異感。前引《太平寰宇記》也證明蠻民產生了族群認同：“東海上有野人，名曰庚定子。舊說云昔從徐福入海，逃避海濱，亡匿姓名，自號庚定子，土人謂之白水郎。”蠻民自稱“庚定子”說明他們對本族群有認同，土人將其稱為“白水郎”則是土人群體認識到與蠻民群體的相異。蠻民既存在族內認同感，又存在族外認異感，族群認同形成。必須指出，我們不能對宋代蠻民的族群認同估計過高。他們在水上流動，經濟貧困，無法形成大的親屬集團，他們的族群認同更多的是行業的認同和籍貫（即日常灣泊地）的認同。周去非對欽州蠻民進行的分類也體現這一點：“欽之蠻有三：一為魚蠻，善舉網垂綸；二為蠔蠻，善沒海取蠔；三為木蠻，善伐山取材。”<sup>⑥</sup> 魚蠻、蠔蠻、木蠻因執業不同而形成不同團體，他們雖都被名為蠻，其內部仍有區別。周去非所講欽州蠻、廣州蠻，則是以籍貫來劃分。他們處在不同地域，彼此之間也不可能有強烈的族內同一感。直到近代，都沒有證據表明，被漢人名為“蠻”的群體形成統一的族群認同。因此，宋代蠻民的族群認同只是行業性的、區域性的，處在初級水平。

綜上所述，水居蠻民的命名起於宋代嶺南，是嶺南社會發展與變遷的結果，是漢文化在嶺南佔據主導地位的體現。這一稱謂，為後世各代所繼承，成為南方沿海地區水居族群的專稱。宋至明清，儘管全國的正規戶籍並沒有蠻戶這一類型，但在嶺南，蠻戶卻在政府公文明載，各類文獻涉及這一族群時也不稱他們為船戶，而徑直稱為蠻戶，這是宋代開始形成水居蠻民族群的一種體現。

（詹堅固 廣州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

<sup>⑤</sup> 周玉蓉，〈汕尾水上居民的族群關係和族群認同〉，收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編《族群與族際交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91。

<sup>⑥</sup>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3.115。